

国际大事

美苏关系

美苏两国关系自1985年1月1日内瓦首脑会晤后，开始由长期对峙的局面，步入既对抗又对话的新阶段。1986年是这一新阶段的头一年，美苏关系呈现出对话与对抗交织，对话时不放弃争夺，对抗时不危及对话的微妙局面。

1986年元旦之夜，美国总统里根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互向对方人民致新年贺词，双方表示要在新的一年里进一步改善两国关系，加速军控谈判，使1986年成为“和平年”。次日，两国代表开始就戈尔巴乔夫访美并与里根会晤再度交换意见。这一积极姿态给新的一年带来了和缓的气氛。但事隔不久，双方便在军控问题上展开了一年中的首次交锋。1月15日，戈尔巴乔夫提出了15年内分三个阶段彻底销毁核武器的一揽子计划新建议。里根政府经反复研究后，于2月22日提出一项三年内销毁美苏全部中程导弹的反建议。两个建议各有各的打算。苏联提出了核裁军的时间表，确定了削减核武器50%的时限，并主张在第一阶段全部销毁双方在欧洲的中程导弹等。苏的新建议意在将核裁军与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挂钩，并禁止核试验。美国一直反对把核裁军与战略防御计划相联系。因此，美的反建议重点谈中程导弹的单项裁减问题。这与苏的一揽子核裁军主张是相悖的。在中程导弹问题上，苏只提销毁美苏在欧洲的中导，而美则强调应包括苏在亚洲的中导；苏的新建议未与英、法中程核武器相联，这与以往相比是个进步，但苏却提出个附加条件，即美不准向英、法提供核武器，英、法亦应冻结现有的核武库，此为美所拒绝。此外，苏将禁止核试验作为建议的重要内容之一，欲以此来限制美对战略防御计划的研究。美拒绝接受，强调在禁止核试验前应大幅度削减核武器并纠正苏已占优势的常规武器不平衡状况。

苏联指责美国的反建议是非建设性的。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中评论美的反建议时说，很难看出美国当局在认真切实地解决消除核威胁的基本问题。美苏两国领导人在核裁军建议上的争论，直接影响了正在进行的美苏第四轮日内瓦军控谈判。3月3日，该轮谈判未获结果。会后双方代表相互指责。与此同时，美苏双方在举行首脑会晤的问题上亦出现分歧，戈尔巴乔夫坚持要把“核裁军应有进展”作为会晤的先决条件，而美表示不会为举行会晤而向苏让步。里根声称，如戈尔巴乔夫今夏不访美，他将取消原定次年访苏的计划。

此后，两国关系渐趋冷淡。3月7日美指责苏驻联合国人员从事了与该机构事务无关的活动，要求苏在1988年4月1日前将其驻联合国代表团人员从275人减为170人。苏提出强烈抗议。一周后，苏以“从事间谍活动”为由，驱逐了美驻苏使馆一外交官。14日里根总统发表题为

《自由、地区安全与全球和平》的外交咨文，提出要以“低烈度战争”的新策略，将苏在世界热点地区的势力推回去。苏在1月15日宣布将1985年8月倡议的单方面暂停一切核试验的期限（1986年1月1日）延长3个月，并表示如美响应，苏将继续延长期限。美不予理睬，于3月22日进行了本年来首次地下核试验。29日戈尔巴乔夫又主动表示，愿在近期内就禁止核试验问题与里根会晤。里根拒绝会晤。4月4日，戈尔巴乔夫会见美国会众议院外委会主席丹特·法塞尔时，指责美国违背了苏美日内瓦最高级会晤关于不允许核战争和谋求对另一方优势的精神。

然而，美苏从各自利益出发都不愿对抗失控。4月8日里根接见即将离任的苏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多向里根递交了戈尔巴乔夫的一封信。信中表示“非常愿意”就核裁军问题同美对话。会见后，美国务卿舒尔茨立即宣布，美苏双方都同意举行第二次首脑会晤。两国外长定于5月聚会华盛顿为首脑会晤作准备。同日，戈尔巴乔夫公开表示不带任何先决条件与里根会晤。

4月15日，美国以反恐怖主义为由大规模空袭利比亚。苏当即宣布取消拟定中的两国外长会晤，并强烈谴责美的侵略行径。20日戈尔巴乔夫警告说，如美一意孤行，那么举行首脑会晤是没有意义的。5月4日，戈尔巴乔夫通过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向里根发出“想不想按原计划会晤”的信号，里根旋即表示他向戈发出的访美邀请“仍然有效”。至此，美空袭利比亚后处于低潮的两国关系再度松动。但到5月底，两国又在是否继续遵守双方于1979年签署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问题上爆发新的争吵。27日里根宣布，“鉴于苏联经常违反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美今后发展战略核力量将以苏联威胁的程度来决定，而不再受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约束”。里根声称，这一作法是否实施要看苏今后的表现。苏立即作出强烈反应，断然否认苏联违反条约，指责美国企图维持单方面军事优势。苏还表示将采取相应的反击措施，并警告说，如美不遵守条约，年内的首脑会晤就可能取消；如里根政府的决定一旦实施，苏将不再受两个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的约束。苏联一方面采取强硬态度，一方面又谋求西欧国家说服里根重新考虑其决定。里根此举在国内也遭到大多数国会议员的强烈反对，亦引起盟国的严重不安。在此情况下，里根于6月中旬表示如苏联能在核裁军问题上采取正确行动，可考虑收回已作出的决定。

6月11日，苏联代表团在第五轮日内瓦军控谈判中提出了一个核裁军的“中间方案”，使陷于僵局的谈判出现了松动。“中间方案”作了较大让步：允许中程导弹与其他核武器谈判脱钩；首次表示美可在实验室进行战略防御计划的研究工作，但前提是双方得达成一项15年不退出限制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协议；同意不把美部署在欧洲前沿的核武器计算在战略武器之内，并表示可冻结苏在亚洲地区的中程导弹，将两国战略核武器限制在同等水准上。对此美国反应积极，19日里根称赞“苏在核裁军问题上开始作出新的努力”，但同时又表示“不能不加修改地接受这一方案”。美国政府中一些持反对意见的高级官员认为，苏欲用反弹道导弹条约束缚美，以“只准在实验室进行”的限制来扼杀战略防御计划。因该计划的很大一部分实验须在太空进行。为此，他们呼吁里根不能接受苏的建议。26日为期七周的第五轮日内瓦军控谈判结束，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里根对此感到遗憾，但表示要认真研究苏的方案。

7月25日里根提出反建议：以推迟七年半部署战略防御计划为条件换取苏同意美在太空进行实验，并允诺苏分享该计划的利益。29日苏表示准备让步，但让步须是相互的。8月4日苏宣布两国外长定于9月19~20日在华盛顿会晤。与此同时，两国还签署了13项人员交流计划，因而双边关系复趋缓和。

然而，8~9两月，两国突然爆发一场间谍战，使双边关系再次蒙上阴影。8月23日，美国

以从事间谍活动为由拘捕了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的苏联人扎哈罗夫。一周后，苏联以同一理由逮捕了《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驻莫斯科记者丹尼洛夫。里根为此致函戈尔巴乔夫，担保丹不是间谍，要求苏尽快放人。苏不但不予理睬，反而要对丹提出起诉。9月17日美采取报复，限令苏驻联合国代表团中的25人在10月1日前离美。19日里根突然召见前来会晤美国务卿的苏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对苏拒释丹尼洛夫表示强烈愤慨。在19~20日的两国外长会谈中，双方将原定筹备首脑会晤的议题搁置一边，专门讨论丹尼洛夫事件。会谈未有进展，但两国外长达成默契：如此后能找到解决丹尼洛夫事件的途径，两人将再行会晤。23日两国外长在联合国再次会晤，内容未透露。两天后，苏发言人说苏对尽快解决丹尼洛夫事件表示乐观。29日丹尼洛夫和扎哈罗夫分别获释回国。30日里根突然宣布他将于10月11~12日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同戈尔巴乔夫会晤，并称这是戈提议举行的一次非正式会晤，旨在为戈访美作准备。

10月11~12日，美苏首脑在冰岛会晤，就军备控制问题展开全面交锋。双方经过讨价还价，在削减战略核武器、中程导弹、地区性冲突等问题上，立场一度十分接近。特别是在削减50%战略核武器、销毁双方在欧洲的中导和关于遵守限制反弹道导弹条约期限（10年）的问题上，都已达成口头协议。但在最后拍板时刻，双方在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戈尔巴乔夫坚持一揽子裁军计划，一定要把核裁军与战略防御计划挂钩，并坚决要求10年内美的战略防御计划研究不许越出实验室。里根表示无法接受苏旨在扼杀该计划的要求，坚持要在太空试验，但声称该计划的实施可以推迟10年。双方各持己见，相持不下，最后连可能达成协议的其他问题也不再讨论，草草收场。

冰岛会晤后，双方首脑先是互相指责，推卸责任。舆论界也因此充斥悲观论调，称之为失败的会晤。但不久双方又改变调子。戈尔巴乔夫强调冰岛会晤并非徒劳，“它为美苏走出死胡同创造了现实的可能性”。里根政府则称会晤是“新的起点”，有助于进一步谈判。双方对会晤的重新评价又使会晤后出现的紧张气氛有所缓和。

接着，美苏又重开“驱逐战”。10月19日苏宣布驱逐5名美驻苏外交官。苏解释说，苏早已准备好了对美前些时候驱逐苏驻美外交官的回敬措施，只是因冰岛会晤而未予实施。21日美点名驱逐5名苏驻美外交官，同时要求减少50名苏驻美外交人员。22日苏限令5名美外交官于11月1日离苏，并对美驻苏使领馆和临时访苏人员外出采取严厉限制措施；苏撤回了美驻苏使馆和驻列宁格勒总领馆工作的260名苏联雇员。戈尔巴乔夫声称，如美使这种措施升级，苏将继续回报。23日美采取主动，宣布美苏互逐外交官斗争暂告结束。苏对此表示满意。

11月12日，为期八周的美苏第六轮日内瓦军控谈判结束。此次会谈，双方都提出了各自的“一揽子裁军建议”。两项建议在许多方面接近：同意在5年内削减50%洲际导弹（包括轰炸机在内），各自保留6000枚核弹头和1600个导弹发射器；全部销毁欧洲中程导弹，“在全球范围内”各自保留100枚此类导弹；对短程导弹应有限制并就此举行谈判；10年内不退出限制反弹道导弹条约。但双方在关键性的战略防御计划问题上，分歧依然如故，致使此轮谈判未能达成任何协议。

11月28日，美部署第131架携带巡航导弹的B-52战略轰炸机。此举打破了美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中有关只准美部署130架此类飞机的规定。里根总统早在当年5月就放风要突破条约，后因内外压力并考虑到尚未举行的首脑会晤，故暂时搁置。现冰岛会晤已过，戈尔巴乔夫近期内又不会访美，里根乘机争夺优势。对美的违约行为，苏迅速作出反应。正在印度访问的戈尔巴乔夫指出美的决定是个严重的错误，使两国更难找到裁军的办法。12月5日，苏联

政府声明，苏暂时不退出限制战略武器条约。18日苏宣布从1987年起如美进行核试验，苏将中止单方承担的暂停核试验义务。1986年以来苏曾四次延长单方暂停核试验期限，希望美方响应，但美在一年中接连进行了18次核试验。

12月30日苏外交部发言人宣布，“由于目前苏美关系不好，1987年元旦，两国首脑将不互向对方人民致新年贺词。”这位发言人在解释这一决定时说，“在当前情况下相互发表贺词也不会有令人高兴的调子”。

综观一年来的事实，美苏两国关系时松时紧，很不平静。特别是双方在技术制高点的太空武器问题上，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异常激烈，致使改善双边关系的步履缓慢。但在双方你争我夺的过程中，也不乏互有让步，这主要表现在核裁军问题上：中程核武器的分歧基本解决，战略核武器方面的意见正在接近，太空武器问题上的立场有所松动。所有这些都为以后两国进一步改善关系并达成某一单项核裁军协议提供了可能。

(吴龙森)

柬埔寨局势

1986年，柬埔寨人民在民柬联合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在军事、政治、外交各条战线上采取了一系列主动行动，取得了明显成效，使柬埔寨形势出现了有利于民柬爱国力量而不利于越南侵略者及柬伪政权的新发展。一个全民族抵抗越南侵略者的新局面正在形成。

早在第七个旱季攻势（1984年10月至1985年4月）伊始，越南当局为急于用军事手段解决柬埔寨问题，制订了一个代号为“K—5”的新的军事行动计划，企图在二三年内摧毁民柬在柬泰边境地区的主要基地，全面封锁边界，切断边境沿线的民柬运输通道；同时集中力量加强内地“清剿”，以彻底消灭抗越爱国武装力量，巩固柬伪政权。作为实施“K—5计划”的第一步，侵柬越军在第七个旱季攻势中，出动数万部队，调集大量坦克、大炮，沿柬泰边境由北而西，先后攻占民柬三派武装力量的16个基地，而后又以重兵把守这些地区。面对这一严峻的局势，1985年初，民柬联合政府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决策：将以往的与越军在边境地区的对抗转为深入内地打游击，即将战略重点转入内地。截至1986年底，民柬国民军2/3以及西哈努克民族主义军和以宋双总理为首的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阵线领导的民族解放军的大批兵力转入内地，逐渐形成了以洞里萨湖周围地区及金边附近为第一战场，柬泰边境为第二战场，柬内地其他地区为第三战场的武装斗争格局。民柬抗越武装力量在上述各战场，联合开展游击战，对越南侵略军把守的重镇连连发起进攻，牵制住了内地的越军主力，迫使越军由原来的疯狂进攻转为以防御为主，并使越军不得不推迟第八个旱季攻势（1985年10月至1986年4月）。

1986年战场处于胶着僵持状态。爱国武装力量在各条战线频繁出击；越南侵略军则丧失以往的大规模攻击能力，被迫分散于各条战线，守大于攻。年初越南侵略军继续推行“外堵内剿”的“K—5计划”。在柬泰边界地区，越军强迫数十万柬埔寨平民挖壕沟、架铁丝网、埋设地雷带，修筑障碍防御线，并分段驻军，妄图“净化”和封死边境。在内地，向民柬国民军一直据守的马德望省西南部拜林一带的基地集结兵力；在西部的菩萨、马德望、暹粒、奥多棉吉等省部署八九万部队，并调集大量苏制坦克、大炮、火箭等各种武器和弹药，妄图加强“清剿”，

彻底消灭抗越部队的有生力量。为此，还在内地加紧建立“战略村”，以切断抗越部队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而抗越部队则一面加强根据地的建设，一面采用避实就虚的游击战打法，集中优势兵力攻打越军的重点目标。为加强协调作战，民柬三方部队于3月成立军事协调委员会。这样，除与越南接壤的柴桢、波萝勉、荣胶、干丹省和若干城镇，境内到处都有游击队的活动。

在1986年的一年中，抗越部队在洞萨里湖周围的马德望、菩萨、磅清扬、磅同、暹粒等五省频繁出击，袭击马德望、磅同、暹粒、磅士卑、荣胶和蒙多基里六个省城，多次袭击包括金边周围五个县城在内的许多重要城镇，以及金边的波成东机场和马德望的贝占机场，并且在越南当局认为是“可靠后方”的波萝勉省、荣胶省、贡布省和磅湛省东部开辟了战场。尽管侵柬越军频繁地使用空军进行轰炸、扫射，但由于战线太长，兵力分散，均未能对抗越部队构成实际威胁。据民柬国民军总司令部于4月30日和10月7日发布的旱雨两季战绩公报指出，国民军在全国各战场上共打死打伤越军36200人，攻克和摧毁越军连排据点414个、营团据点90个、师级据点6个；击毁越军坦克和装甲车30辆、飞机7架、各种大炮92门、各种汽车872辆、火车机车4台、车皮65节、汽艇210多艘、苏制大型渡船1艘；击毁雷达站和军事训练中心5处；切断铁路和公路470多处；炸毁桥梁和涵洞19座。此外，缴获的敌军武器和弹药比过去任何一个旱雨季都多。在雨季作战中，抗越部队解放了2000多个村庄，袭击了360多个越伪乡政权，以及金边市和6个省城。

在抗越部队1986年对越军发起的攻击中，规模最大的是3月28日袭击马德望市及其机场一役。民柬国民军、西哈努克民族主义军和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阵线的部队联合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紧密配合，协同作战，从数十处同时发动进攻，瓦解了马德望市郊和附近地区的伪政权，有些部队甚至攻进了市中心。此次战役成了变全局上的敌强我弱为局部上的敌弱我强的生动例证。在这次战役中，越军伤亡200余人，其中包括1名营长，3名连长；打死2名苏军顾问；摧毁3辆坦克、87件各式武器、1座弹药库和3个军事设施，袭击了1个机场。越军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不得不从西部、北部和东部调回一部分精锐部队，加强对金边和其他省城的防卫。目前，无论在内地还是边境地区，抗越力量在不断壮大，基地日趋巩固。而越军面对抗越部队的攻击，既要驻守西部边境地区，又要保护内地城镇和交通线路，顾此失彼，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为摆脱困境，越南当局继续不断向东增兵。据统计，1986年越向东增兵达35000余人。但这也改变不了柬战场已经形成的僵持局面。

1986年柬埔寨爱国力量在政治上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抗越部队认真执行军事与政治工作相结合的方针，广泛宣传“高棉人不打高棉人”、“高棉人联合起来打击越南侵略者”等政策，使心向民柬联合政府的群众越来越多。游击队所到之处，都得到当地人民群众和韩桑林部队中爱国士兵的协助。他们不但向游击队提供粮食和情报，掩护伤病员，还带领小分队潜入敌人防御圈内侦察，绘制作战地图。在民柬部队正确而强大的军事和政治攻势下，越军和韩桑林部队士气低落，厌战情绪不断增长，战斗力下降。据民柬电台报道，1986年越军开小差人数高达1.2万，韩桑林部队逃跑、哗变和投诚的人数共达4000余人。

1986年3月17日，民柬联合政府在民柬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主持下，在北京召开内阁会议。民柬三方经过充分协商，共同提出关于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八点建议。其要点是，越南可与民柬三方联合政府谈判其军队全部撤出柬埔寨的进程，越军应在明确规定的日期内分两阶段撤完；在越南完成第一阶段撤军后，韩桑林政权可同民柬联合政府三方谈判，筹组柬埔寨四方联合政府。这一建议采纳了国际上一些友好或中立国家关于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各种

方案中的合理部分，充分表现了民柬联合政府的和平诚意和对越南的克制忍让态度，表达了民族和解和民族团结的愿望。这一建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的欢迎和支持。东盟五国、日本、欧洲共同体、澳大利亚等都给以程度不同的肯定评价。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认为这是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中的突破，并表示将以此为基础同越南接触，以推动政治解决。到1986年底正式表态支持八点建议的国家已有60多个。

然而，这一合理建议却遭到越南当局的拒绝。4月20日，越南外长阮基石在解释越拒绝“八点建议”的理由时说，八点建议没有承认“韩桑林政府”是合法政府，却要求越南承认民柬联合政府；“韩桑林政府”已全部统治柬埔寨，而民柬三派却在北京开会要求成立四方联合政府，仅给韩桑林1/4的位置，因此，民柬的建议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越南拒绝八点建议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在国际上的处境更加孤立。在四十一届联大会议辩论柬埔寨问题时，有44个国家代表发言谴责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和占领，其中有2/3的代表明确表示支持“八点建议”。大会以116票赞成、21票反对、13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由60个国家联合提出的要求外国军队撤出柬埔寨的决议案。这是联大通过的第八个要求越军撤出柬埔寨的决议案。赞成票比1985年增加2票，比1979年增加25票。而越南代表却一反往年在大会上进行无理纠缠的作法，宣布不参加关于柬埔寨局势问题的辩论，以逃避国际社会的谴责。

(周必忠)

阿富汗局势

1986年，侵阿苏军与阿富汗游击队在战场上的军事较量空前激烈，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日内瓦间接谈判毫无进展，整个阿富汗局势仍然处于僵持状态。

苏联于1979年12月27日出兵阿富汗，七年来给阿富汗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据联合国统计，截至1986年，已有150万阿富汗平民惨遭杀害，500万难民（占全国人口1/3）逃往巴基斯坦、伊朗以及其他穆斯林国家。但是苏联非但未能实现其迅速消灭阿富汗抵抗力量的企图，反而步步陷于侵略战争的泥潭。侵阿苏军已消耗了近200亿美元，损失了600多架飞机和1800多辆坦克和装甲车，伤亡4万人，其中1/3以上是死亡人数。为了摆脱困境，1986年苏联在策略上作了些调整，对抵抗力量采取了“和平攻势”与“军事围剿”兼施的“双轨政策”。

1986年内，苏联不断放出和平空气，表示要加速阿富汗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2月11日，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在会见负责阿富汗问题间接谈判的联合国秘书长私人代表科多维斯时说，苏联希望1986年在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方面取得重大进展。7月28日，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发表讲话，宣布苏联到1986年底将苏军六个团从阿富汗撤回。为改善喀布尔政权形象，苏联采用“换马”手法，于5月4日用原阿富汗情报局长纳吉布拉取代卡尔迈勒，出任人民党总书记。纳吉布拉上台后，根据苏联授意，一面向各抵抗力量领导人发出“和解”呼吁，提出所谓“共同享有权力并参加新阿富汗”的建议，一面对部族头领、宗教领袖和社会人士采取怀柔政策，吸收一批非党人士参加政府和革命委员会。10月底，苏联从阿富汗撤走六个团，约8000人，以示其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诚意”。然而，这六个团仅占12万侵阿苏军的7%，而且其中有三个防空团，一个装甲团，这些部队在多山之国的阿富汗和对付

没有空军的游击队，并无多大军事价值。在1986年5月5~23日和7月31日至8月8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喀布尔政权的第七、第八轮间接谈判中，苏联方面仍然拒绝拿出一个全面的撤军时间表，并且坚持“先保证、后撤军”的条件，即苏联必须首先得到停止对阿富汗的“外来干涉”的“国际保证”，然后才能从阿富汗撤军。喀布尔政权提出苏联撤军需3~4年的时间，而巴基斯坦明确指出，苏军应在达成协议后的四个月内全部撤完。由于双方立场相左，致使谈判无法取得进展。

苏联在做和平姿态的同时，加紧了对阿富汗抵抗力量的军事围剿。新年伊始，苏联就向阿富汗增运了大批重武器，其中包括榴弹炮、加农炮、米格—24武装直升飞机、地面攻击机和ABOOS—80中型新式坦克。仅在1~2月中旬的冬季攻势中，苏军就向阿东部的楠格哈尔省接连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进攻；6~8月中，又向靠近伊朗边界的坎大哈和赫尔曼德、喀布尔以南的洛加爾等地的阿游击队基地发动猛烈进攻。此后，苏军军事行动进一步升级。8月中旬，苏军和喀布尔政府军共万余人，向控制赫拉特市老城区的游击队发动围攻，摧毁了老城区的大部分建筑和历史古迹。8月底至9月初，数千名苏军在坦克和飞机掩护下，大举进攻瓦尔达克省辛兹山谷的游击队营地，夷平了该地区的许多村庄，近百名无辜者被打死。9月上旬，苏军在进攻帕格曼山谷时，施放了化学毒气，47名平民和游击队员当场中毒身亡。10月初，大批装备精锐的苏军开进喀布尔省的沙克尔达拉地区，在那里烧杀掠夺达十天之久，使该地区几乎成了“无人区”。

在战略战术上，苏军改变了往年采取规模庞大的军事行动的做法，代之以团、营建制的中小规模的进攻。他们采取化整为零、分兵合击以及用突击队对付游击队等多种手段。苏军还凭借空中优势，对阿富汗游击队最活跃的地区实行狂轰滥炸的“焦土政策”，企图消灭游击队的有生力量，切断游击队与外界的联系。为了加强喀布尔政权进而达到长期控制阿富汗的目的，苏军大肆构筑各种永久性的军事设施，在重要城镇和军事基地周围制造“无人区”，建立“安全防御地带”。苏军和喀布尔政权还对巴基斯坦边境地区进行频繁的军事入侵和恐怖活动，使该地区的平民和阿富汗难民不断遭到生命和财产损失。据统计，仅在1986年5~9月的五个月中，苏联对巴基斯坦的侵犯事件就达600多次。国际舆论认为，苏对巴的侵犯和恐怖活动旨在逼迫巴基斯坦在政治谈判中让步。

面对苏阿军队的猛烈进攻，阿富汗各派抵抗力量加强团结，互相配合，广泛而巧妙地展开游击战，不断取得新战果。1986年，阿富汗各地游击队普遍活跃，一向比较沉静的中部各省，也不断传来游击队重创敌军的消息。游击队还特别加强了在靠近苏联边界的北部各省的战斗活动，袭击敌后的军事设施。这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苏军对阿富汗其他地区的攻势。游击队在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同时，注意利用战场缴获的军火和物资武装和补给自己，从而缓解了抵抗力量的供应困难。由于游击队的顽强战斗，苏阿军队的冬春季攻势并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在夏季攻势中，游击队击退了敌人规模最大的一次进攻，保住了洛加爾山谷武装斗争根据地。在赫拉特城，游击队粉碎了敌人在城周围建立“安全地带”的计划，拔掉了60多个哨所，控制了该城的西部地区。苏军在阿富汗的主要空军基地巴格拉姆机场曾遭游击队袭击，喀布尔的阿富汗情报总局大楼被游击队摧毁，苏联驻阿使馆也屡遭袭击。为了统一指挥，协同作战，阿富汗北部七省游击队于7月成立了“联合抵抗最高指挥部”。在集合力量、协调行动的基础上，游击队在昆都士、塔哈尔和巴格兰三省交界处打了个大胜仗，既消灭了大批敌军，又捍卫了新建的游击队根据地。据统计，游击队在1986年的各次战役中，共击毙敌军3000余人，其中包括1名师

长和2名苏联顾问；打伤1500余人；击落敌机214架，坦克和各种军车310辆，并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粮食。

苏联入侵阿富汗并一再拖延从阿撤军，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1986年11月的第四十一届联大以122票对20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决议，敦促苏联立即无条件从阿富汗撤走全部军队，维护阿的主权、领土完整和不结盟的地位，让阿富汗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命运。这是自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以来，联大第八次通过这样的决议。

(钟林)

菲 律 宾 政 局

1986年菲律宾的政局发生了急剧变化。统治菲律宾达20年之久的马科斯终于下台，科拉松·阿基诺政权建立，未遂政变迭起，局势动荡不稳。

1983年8月21日，菲律宾著名反对派领导人贝尼格诺·阿基诺自美国返回菲律宾时，在马尼拉机场被刺。这一事件成为菲律宾政局发展的转折点。此后，菲律宾国内掀起了反对马科斯政权的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政治运动。1985年11月，马科斯总统宣布于次年2月7日提前举行大选。12月3日，贝尼格诺·阿基诺的夫人科拉松·阿基诺正式宣布作为反对党总统候选人参加总统选举。大选开始后，各阶层群众不断举行反对马科斯的示威活动。成千上万名阿基诺夫人的支持者涌向马尼拉街头，要求马科斯下台，并同军警发生冲突。在大选过程中，先后共有100余人死于与大选有关的暴力事件。1986年2月15日菲律宾国民议会宣布马科斯以1000余万张选票获得总统选举的胜利。阿基诺夫人指责马科斯在大选中舞弊，宣布不承认官方公布的选举结果，并于16日在首都马尼拉举行上百万人的抗议集会。

2月22日，国防部长恩里莱和武装部队代理参谋长拉莫斯发动兵变，宣布与马科斯总统断绝关系，转而支持阿基诺夫人。同日，美国总统里根在听取了去菲律宾观察大选的美国特使哈比卜的汇报后表示，菲律宾兵变表明总统选举有舞弊行为，破坏了选举的合法性。25日晚，马科斯及其亲信被迫飞离菲律宾，前往美国。马科斯家族对菲律宾长达20年的统治遂告终结。同日，阿基诺夫人宣誓就任总统，成为菲律宾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总统。

新政权成立后，科·阿基诺总统为稳定国内局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其一，迅即宣布组成新内阁，任命统一民族民主组织主席、副总统劳雷尔为总理兼外交部长，恩里莱为国防部长，拉莫斯将军为武装部队参谋长，以及包括前内阁成员的十几名部长，并成立八个特别委员会，着手处理外交、财政、劳工等主要部门的工作。

其二，清除马科斯及其亲信的势力和影响，撤换了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亲马科斯的文职官员，仅市长就撤换了1000多人；解散了前执政党新社会运动控制的国民议会；改组了最高法院和军警的领导机构；成立了人权委员会，负责清查过去侵犯人权的行为；冻结并没收马科斯及其亲友在国内外非法聚敛的财产(据调查，马科斯本人及其直系亲属、亲戚、部下及密友非法侵占的财产价值达100亿美元)；解除了一些同马科斯关系密切的高级将领职务，其中包括武装部队前参谋长法维安·贝尔。

其三，争取同反政府势力和解。科·阿基诺在就任总统后举行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布：

“新政府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实现民族和解”。不久即下令大赦政治犯。在短短一个月內，就释放了517名，其中包括菲律宾共产党创始人、前主席西松和前新人民军司令布斯凯诺等四位菲共领导人。新政府还废除了马科斯当政期间颁布的一系列剥夺公民基本权利的法令，恢复1981年被马科斯废除的人权保障法。科·阿基诺总统还多次表示希望同进行武装斗争的菲共举行和平谈判，并主张改善同最大的穆斯林反政府武装组织摩洛民族解放阵线的关系。

其四，争取经济状况的好转。在马科斯执政的最后两年里，菲律宾经济濒临崩溃。国民生产总值连续出现负增长，外债高达260多亿美元，国库空虚，通货恶性膨胀。失业、半失业人数高达700多万，7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之下。贫富差别极为悬殊，阶级矛盾日趋尖锐。阿基诺夫人接管政权后立即宣布，新政府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是“减轻群众的贫穷，创造就业机会以及公平地分配国家财富”。新政府为恢复经济采取了改革措施，包括：取消马科斯及其亲信对于农业命脉糖业和椰业的垄断；鼓励私人投资，加快发展中、小企业；优先发展农业；欢迎外资；重新制定预算和金融政策，减少货币发行量；召开政府、工人、资方三边会谈，促进劳资合作等。5月底，阿基诺夫人批准一项全面发展农业的计划，其中包括把部分公有土地分给无地农民、降低农业贷款利率、减少农产品出口税、支持乡村企业发展等。此外，政府还降低了石油及日用消费品价格。由于实施上述措施，菲律宾经济连年下降的势头得以制止。全年粮食产量增长3.3%，国民生产总值上升0.12%。

其五，争取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持。新政权宣布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坚持与东盟国家保持一致和合作，加强同亚洲及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增进同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交往。科·阿基诺总统和劳雷尔副总统先后出访了东盟国家、美国、西欧国家、中国和日本，得到大量经济援助，提高了菲律宾的国际地位。关于美国在菲律宾的两个军事基地，阿基诺夫人表示要维护菲律宾的主权完整，同时表示尊重菲美军事基地协定，在1991年现行条约期满前保留这两个基地。

科·阿基诺政府的内、外政策为稳定国内局势起了积极作用，受到人民一定程度的欢迎和支持。

但是，新政权仍面临许多严重的内外矛盾，政局依然不稳。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马科斯的残余势力不断制造事端，企图推翻现政权。

流亡美国夏威夷的马科斯多次声称他是菲律宾真正合法的总统，并指定前外长、他的副总统候选人托伦蒂诺为“代总统”。4月中旬后，马科斯的支持者接连组织反政府示威。5月1日，马科斯的追随者与支持新政府的工人在马尼拉街头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至少有50人受伤，56人被捕。7月6日，托伦蒂诺在几名将军和300多名军人的支持下，占领了马尼拉宾馆，宣布就任“代总统”，并组织了约5000人在宾馆附近的公园里集会，扬言要向总统府进军。政府迅速出动武装部队，平息了这次反叛。11月22日晚，支持恩里莱的200多名军人秘密集会，计划于24日占领国民议会大楼并重建国民议会，迫使总统下台。科·阿基诺总统在拉莫斯参谋长的支持下，抢先行动，制止了未遂政变。与此同时，马尼拉、西棉兰老等地区接连发生绑架、暗杀、爆炸、抢劫和罢工事件，对政局的稳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9月29日，正当政府与10个反政府组织组成的全国民主阵线于8月5日开始的和谈处于关键时刻，菲律宾共产党领导人、全国民主阵线顾问鲁道夫·萨拉斯被番号不明的军队逮捕。11月12日，菲律宾人民党主席兼菲律宾最大工会“五·一运动”主席罗兰多·奥拉利亚被暗杀。次日，20个民间团体在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前联合举行万人抗议集会，谴责残杀奥拉利亚的行径。14日，全国民主阵线致函政府中断和

谈，以示抗议。17日始，“五·一运动”工会组织万人大罢工，要求政府弄清谋杀案的真相。其间，又发生日本三井公司马尼拉分公司负责人若王子信行于15日在马尼拉附近遭绑架，19日马尼拉商业区一家百货商店被炸等事件。此外，菲工潮不断，仅1~9月就发生了480次罢工。

在政府内部，各派政治力量在一些重大政策问题上分歧严重，并逐渐公开化。以国防部长恩里莱为首的一些军方人士反对阿基诺夫人对新人民军和摩洛民族解放阵线穆斯林武装力量采取和解政策，认为这是“软弱”的表现，主张解除左派内阁部长职务，以武力消灭菲共和新人民军。同时，恩里莱坚决反对新宪法起草委员会通过的把科·阿基诺总统的任期延长到1992年6月30日的决议，要求在1987年再举行一次总统选举。此外，恩里莱对阿基诺夫人在全国清洗亲马科斯的官员、解散议会、废除旧宪法、成立新宪法起草委员会等做法也持有异议。10月初以来，恩里莱多次在广播、报纸上发表讲话，猛烈批评和攻击科·阿基诺总统，并拒绝出席内阁会议。他还多次参加马科斯支持者举行的集会。

迫于严峻的局势，11月23日，科·阿基诺总统召开内阁特别会议，要求所有内阁成员提出辞呈，并宣布首先接受国防部长恩里莱的辞职，任命原副部长伊莱托为新国防部长。这一改组内阁的断然措施，使政府重新控制了局势。

与此同时，在政府和以菲共为首的全国民主阵线的共同努力下，因奥拉利亚被暗杀而一度中断的和谈取得重大进展。11月27日，双方签署了一项初步停火协议，决定自12月10日起停火60天。实施停火后，双方决定将就菲律宾的重建以及有关政治、军事和社会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第二阶段会谈，以实现持久的和平。菲共11月30日发表声明，表示要遵守已达成的协议。此外，政府于11月23日同摩洛民族解放阵线达成避免敌对行动的四点协议后，又于30日派出专门小组前往沙特阿拉伯的吉达，与摩洛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小组举行正式和谈。至此，科·阿基诺政府在推动全国和解方面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仓立德)

两伊战争

由民族矛盾、教派纠纷、边界争端和个人恩怨所引起的两伊战争，从1980年9月22日爆发以来，到1986年底已进行了6年多。6年多来，战争在经历了伊拉克进攻，伊朗反攻两大阶段之后，于1982年12月起进入战略相持阶段，1986年仍然处在这一阶段中。

1986年两伊战争的特点是：双方在陆地、海上和空中频繁较量，战斗规模增大，战况较前更为激烈，互有攻守，各有胜负，势呈拉锯，谁也无力量压倒对方；由于双方停战条件相距甚远，国际调解仍无进展，短期内双方难以罢战言和。

战争的态势，依然双方互有短长，伊朗占地面优势，伊拉克占空中优势。从战略上讲，伊朗利用伊拉克国小人少的弱点，从1985年开始实行“消耗战”，企图在长期消耗战中拖垮伊拉克，但未奏效。于是便于1986年改行“速决战”的新战略。伊拉克则相应调整战略，由所谓“静态防御”转向所谓“动态防御”，即以攻为守，着重利用空中优势，袭击伊朗经济目标，破坏其经济力，从而达到以战迫和的目的。

现将1986年的两伊战争分地面战场、海空袭击和国际调解简述如次。

一、地面战场

地面战场分北部、中部和南部三个战线。其基本态势是：北部战线，伊拉克占领着伊朗约1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中部战线，双方在边界地带反复争夺；南部战线，双方围绕着攻守巴士拉（伊拉克第二大城市）屡屡激战，这是两伊战争主要的地面战场。

地面战场的较量主要有两大回合。

1. 法奥之战。法奥是伊拉克南部濒临波斯湾的石油港口，隔海距科威特甚近。从2月9日开始，伊朗军队在阿拉伯河岸和巴士拉以东地区，以10万之众，向伊拉克发动代号为“曙光—8”的大规模攻势。伊朗军队兵分两路，一路从陆地向巴士拉东北地区插入伊拉克第三军团防区，另一路强渡阿拉伯河攻入法奥地区伊拉克第七军团阵地。经几天激战，伊朗于2月12日攻占了法奥及其以北地区8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伊朗的目的是企图封锁伊拉克出海，切断伊拉克与海湾国家的海上联系，向南威胁支持伊拉克的科威特，向北威胁巴士拉。伊拉克部队奋力反击，于2月14日分三路包围在法奥的伊朗部队。并以飞机、装甲车、大炮、火箭等重型武器猛烈打击阿拉伯河对岸的伊朗支援部队，还出动海军袭击伊朗水上供应线。至3月中，伊朗军队被压缩于不到100平方公里的法奥三角地带。战斗空前激烈，伊朗伤亡2.5万人，伊拉克伤亡1.3万，损失武器无数。但伊拉克未能收复法奥。

当伊拉克部队包围在法奥的伊朗部队时，伊朗为减轻其在南线战场所受的压力，于2月24日向伊拉克东北部边境库尔德人居住的马里万山区发动代号为“曙光—9”的新攻势。到3月上旬，伊朗军队深入到伊拉克境内25公里的苏莱曼尼亚地区，占领了30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伊朗还企图与库尔德族反政府武装相配合，对伊拉克最大的基尔库克油田和伊拉克—土耳其输油管构成威胁。

2. 迈赫兰争夺战。法奥战场沉寂之后，伊拉克在北部和中部曾频频发起进攻，但都规模不大。4月30日，伊拉克军队向伊朗中西部胡齐斯坦省的法克哈亚维和杰纳奈一线发起攻势，占领了252平方公里的土地。5月17日，伊拉克军队向伊朗中西部伊拉姆行政区进攻，19日占领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迈赫兰以及其他几个城镇。伊拉克这一系列攻势的目的，在于挽回未能收复法奥所造成的政治和心理影响，并打乱伊朗的进攻计划。伊拉克政府正式提出用迈赫兰交换法奥，被伊朗拒绝。

6月30日，伊朗在迈赫兰地区发动代号为“卡尔巴拉—1”的攻势，7月2日夺回了迈赫兰。伊拉克军队被迫撤回国界之内。

8月31日和9月2日，伊朗军队又先后在北部哈杰奥姆兰和在海湾西地区发动“卡尔巴拉—2”和“卡尔巴拉—3”攻势，但都未获进展。

此后，地面战场转趋沉寂，双方加紧攻守准备。12月24日，伊朗军队在南线巴士拉以南第三军团和第七军团防区发动“卡尔巴拉—4”攻势，两天即告结束。此次攻势是伊朗来年攻打巴士拉的前奏。1986年底，两伊双方在边境地区陈兵百万，摆开了大打的架势。

综观1986年的地面战场，两伊在从北到南长达1000多公里的战线上进行了上百次大大小小的战役。整个战争态势依旧是势均力敌的消耗战和拉锯战。伊朗的速决战和伊拉克的动态防御以攻谋和战略均未收效。但法奥的陷落和迈赫兰的夺而复失，表明伊拉克在地面战场上略居劣势。

二、油轮战与袭城战

两伊战争中，伊拉克握有空中优势。伊拉克空军除了配合地面部队作战外，还从1985年

8月起,频繁袭击伊朗生死攸关的经济、石油设施,想使伊朗经济瘫痪,难以继续战争。这一战略的运用,在1986年表现得特别明显。

伊拉克主要打击的对象是伊朗的石油设施和装运伊朗石油的油轮。1986年上半年,伊拉克空军就袭击了数十艘油轮,轰炸哈尔克岛石油中转站数十次。下半年,在迈赫兰被伊朗夺回后,伊拉克军队士气下降,而伊朗则扬言要发动“最后攻势”打败伊拉克。伊拉克为稳定军心,重振士气并打乱伊朗对“最后攻势”的准备,决定加紧开展袭城战和油轮战。除继续袭击哈尔克岛和出入伊朗的油轮外,还深入伊朗内地袭击经济和军事目标。7月23日,伊拉克飞机袭击了德黑兰附近的一个兵工厂和伊斯法罕的钢铁厂。8月中,伊拉克出动4~6架法国“幻影”战斗机,飞行1000多公里,远袭伊朗石油中转站锡里岛、拉旺岛和伊朗苏联边界的中东最大的纳卡发电厂,使袭城战达到高潮。在伊拉克的频繁袭击下,伊朗的石油出口由每天160万桶降至60~80万桶。

伊朗以牙还牙,多次用飞机、远程大炮和导弹袭击伊拉克重要经济设施和边界城镇,其中包括南方的巴士拉和北方最大的基尔库克油田。8月12日,伊朗首次用导弹袭击巴格达。11月,双方的空袭达到高潮,伊拉克飞机有时在同一天对同一目标轮番轰炸2~3次,伊朗在这个月内就向巴格达发射了三枚导弹。

三、国际调解与伊拉克的和平攻势

1986年2月两伊的法奥之战,引起世界各国,特别是海湾阿拉伯国家的不安。应阿拉伯国家联盟七国委员会的要求,联合国安理会于2月18日开会讨论两伊冲突升级问题,24日通过582号决议,呼吁两伊立即停火并把军队撤至国际公认的边界。海湾合作委员会举行紧急外长会议,提出了结束战争的五点建议。阿尔及利亚等国派代表在两伊之间进行调解。阿尔及利亚提出了一个分两个阶段实施的和平方案:第一阶段,使战争不扩大到邻国,保证海湾航行的安全和停止互相袭击城市;第二阶段,设立500亿美元的基金,用于伊朗的重建工作。

伊朗在2月25日正式拒绝安理会的决议,其他方面的调解也未被伊朗接受。

8月2日,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发表致伊朗领导人的公开信,提出了结束两伊战争的五项原则:双方全面无条件地撤回到国际边界线;交换全部战俘;两国签署和平与互不侵犯协议;不干涉内政,尊重对方国家的意愿和选择;积极实现本地区,特别是海湾地区的安全和稳定。

伊拉克提出这一和平建议的背景是它在法奥和迈赫兰两次战役中连遭失利后,针对伊朗可能发动的新攻势而对伊朗展开和平攻势,内以安军心民心,提高士气,外以寻求国际支援和同情,孤立伊朗。

8月4日,伊朗对这一建议断然拒绝,并重申坚持要“惩罚侵略者”的立场。伊朗总统哈梅内伊说,伊朗军队将在战场上给予回答。

9月,伊拉克副总理哈齐兹通过联合国再度向伊朗建议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伊朗未予理睬。

一年来,伊拉克虽多次展开和平外交活动和表示愿意接受调解,但伊朗始终拒绝国际调停,坚持打下去的立场,因而两伊战争还看不到结束的前景。

(朱梦魁 袁世垠)

阿以冲突和中东和平进程

阿拉伯—以色列冲突，持续了近40年之久。70年代末期以来，阿以双方打破了长期全面武装对抗、拒绝谈判的格局，开始了部分直接谈判，由此而进入了一个对抗与谈判并存的时期。有关各方曾先后提出过多种中东和平方案，都未能被共同接受。1986年，中东和平进程起伏变化，阿以僵局仍未打破。

一、约巴联合行动搁浅，约巴关系恶化。

1986年中东和平进程中首先发生的一件大事，便是约旦国王侯赛因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阿拉法特于1985年2月达成的约巴联合行动方案（简称约巴协议），经过一年的波折，终于宣告夭折。2月19日，侯赛因在电视讲话中宣布：“约旦决定不再继续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机构进行政治上的协调。”

约巴协议是约巴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和实现中东和平而共同提出的方案，其内容如下：（1）遵照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以色列撤出其在1967年所占的全部阿拉伯领土，以实现全面的和平。（2）一旦约旦与巴勒斯坦能够建立约巴国家邦联，在约巴邦联的范围内，巴勒斯坦行使不可剥夺的自治权。（3）根据联合国决议的原则解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4）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一切方面。（5）举行由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和与冲突有关各方参加的国际会议，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巴解组织与约旦组成联合代表团参加会议，在这种国际会议的范围内进行和平谈判。

为达成这一协议，巴解作出了重大的政治让步：接受了巴勒斯坦人民在约巴邦联范围内实行自决的主张，从而避开了单独成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这个棘手问题；以组成约巴联合代表团的方式，避开了巴解作为单独一方参加国际会议的问题；接受了“以领土换和平”的原则。协议中规定遵照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等于含蓄地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协议只要求以色列撤出1967年所占阿拉伯领土，也就是默认以色列边界以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时为准，不涉及以色列在1948年后超出1947年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分治决议中所规定的疆界而扩大的部分。

但是约巴双方在对协议条文的解释上存在着一些重大的分歧。（1）约旦认为，协议规定接受联合国决议，就等于巴解接受了安理会242号和338号决议；而巴解认为并非如此。（2）约旦认为，先实行约巴联合，再考虑行使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问题，而巴解认为应先建立巴勒斯坦国，然后再建立约巴邦联。（3）约旦认为，西岸是约旦的领土，而巴解认为，西岸是巴勒斯坦国立国的基地。

约巴协议签订后，约旦希望尽早以约巴为一方开始同美国对话，使和平进程动起来。由于美国坚持以巴解接受安理会242号和338号决议为对话的先决条件，约旦曾多次劝说巴解接受这两项决议，但巴解领导内受巴解内部一些组织的掣肘，外遭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反对，故对此表示难以从命。阿拉法特虽曾表示过有条件地承认上述两项决议的可能性，但1985年11月和1986年1月，巴解领导人两次在巴格达开会，讨论如何对待242号和338号决议问题，最后一致认为，安理会的这两个决议，仅仅把巴勒斯坦问题当作难民问题，在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得到保证以

前，巴解绝不接受它。

为了弥合分歧，约、巴之间于1986年1月25日至2月7日，进行了五轮会谈，但都归于无效。2月15日，阿拉法特提出解决巴解接受242号和338号决议问题的三个方案：（1）把242号决议与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联系起来；（2）美国发表声明，保证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包括在他们自己领土上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3）巴解接受242号决议及联合国维护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的决议，其他有关各方也都接受这些决议。美国对此断然拒绝。

侯赛因国王的计划落空，他将此归咎于巴解领导人的出尔反尔，2月19日断然中止约巴联合行动，并指责巴解领导人拒绝接受242号和338号决议，阻碍了中东和平国际会议的召开。

为了不致把门关死，三天以后，侯赛因发表补充讲话，说美国对中东和平进程的失败也负有责任，约旦仍然认为巴解是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巴勒斯坦人应有自决权，约旦将继续坚持约巴协议的精神。巴解领导也表示将继续遵循约巴协议，希望同约旦恢复对话。

尽管如此，约、巴关系还是恶化了。4月，在约旦的怂恿下，法塔赫的军事情报首脑阿布·扎伊姆在安曼发动“纠正运动”，指责阿拉法特将巴勒斯坦人从一个灾难引向另一个灾难，要求阿拉法特下台。7月，约旦决定关闭法塔赫驻约旦的25个办事机构（非全部）。接着又驱逐巴解武装部队副总司令、法塔赫中央委员阿布·杰哈德出境。在此以前，即6月底，约旦为加强西岸和加沙的影响，同巴解争夺人心，进一步排斥巴解，宣布在西岸和加沙推行五年发展计划，拟投资13亿美元建设西岸。但由于筹措资金困难和受到多方阻力而未得实行。

约巴关系的恶化，引起了约旦河两岸巴勒斯坦人的不满，不少人举行了抗议示威。为了缓和事态，侯赛因国王在7月中旬重申：约旦将继续支持巴解领导及其机构。接着，阿拉法特也表示他同侯赛因国王没有矛盾，只是与约旦政府有分歧。

二、约巴协议搁浅后，约巴双方各自调整其内外关系，阿拉伯世界开始新的分化组合。

1. 约旦与叙利亚进一步接近。两国从1985年9月起，已在多年失和之后开始走向和解。约旦首相里法伊与叙利亚总理卡西姆在沙特的吉达和利雅得两度会晤。同年底，侯赛因国王访叙，主动承担了自己在双方某些纠葛中的责任。1986年5月，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回访约旦，就叙约军事协调共同对付以色列等问题作了探讨。约叙接近为叙利亚与其他阿拉伯国家改善关系创造了条件。在侯赛因国王的调解下，叙伊（拉克）关系有了松动。

2. 黎巴嫩难民营之战连绵不断，以色列趁机骚扰黎巴嫩南部。

约旦同巴解疏远而同叙利亚接近，客观上加强了叙利亚在黎巴嫩同巴解矛盾中的地位。巴解武装则自1982年6月以色列入侵黎巴嫩而被迫分散到八个阿拉伯国家后，利用黎巴嫩内部派别斗争和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的大好机会，通过各种途径不断返回黎巴嫩，成为黎境内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这就与在最近几年由黎巴嫩南部发展到贝鲁特而逐步壮大起来的阿迈勒运动发生矛盾。阿迈勒运动担心巴解会影响它在黎巴嫩穆斯林中的主导地位，并抢夺它在黎巴嫩南部的传统势力范围，因而极力打击和限制巴解力量。叙利亚本来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与以阿拉法特为首的巴解主流派就有严重分歧，故支持阿迈勒运动向巴解力量发动进攻。1985年5月首开战端之后，难民营之战时起时落。1986年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战斗。第一次发生在1986年4月，打了13天。第二次在6~7月，打了30多天，交战的地点是贝鲁特西区和南郊萨卜拉、夏蒂拉和布拉杰奈堡三个巴勒斯坦难民营及其周围。第三次从9月30日在黎巴嫩南部苏尔地区开始，蔓延到赛达和贝鲁特。战斗断断续续持续了两个多月，到12月中才停息。交战的结果是胜负难分，双方都遭受重大损失，巴勒斯坦人的损失较大。同室操戈，两俱受损，削弱了抗以斗争的

力量。

在9~12月的难民营之战期间，以色列趁机从地面、海上和空中，骚扰黎巴嫩南部，打击巴解武装力量，并镇压黎巴嫩的抵抗运动。自9月下旬以来，以色列在黎以边境集结大批部队，支援亲以的“南黎巴嫩军”。以色列还不断对黎巴嫩南部村庄进行炮击和搜捕，并多次派炮艇和飞机对巴解组织营地狂轰滥炸。

3. 巴解在困难处境下各派关系有所缓和。

巴解受到叙利亚和约旦两面打击，腹背受敌，处境困难。约巴协议的签署，遭到巴解内部一些组织（如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等）的反对。阿拉法特着手谋求改善巴勒斯坦各派组织之间的关系。1986年4月，阿尔及利亚总统沙德利建议巴解各派在阿尔及尔召开和解会议，以阿拉法特为首的法塔赫首先响应，巴解中的许多组织也表示赞同，但受叙利亚影响的巴勒斯坦民族拯救阵线则要求阿拉法特下台和废除约巴协议，拒绝召开巴解各派和解会议。尽管会议被迫一再推迟，巴解各组织并未因叙利亚反对而放弃和解对话。巴解五个组织，即法塔赫、巴勒斯坦解放阵线、民阵、人阵和巴勒斯坦共产党7月底和8月初先后在突尼斯和莫斯科举行会议，就恢复团结问题进行了磋商。11月中旬和下旬，巴解的阿拉法特派和亲叙的组织又先后在布拉格和柏林会晤，讨论实现和解的计划。

三、叙利亚同美以之间发生一场危机。

美国和以色列为推行其与阿拉伯国家分别直接谈判、单独媾和的计划，一面以约旦为重点，拉拢温和派阿拉伯国家，一面以叙利亚和利比亚为重点，打击激进派阿拉伯国家。1986年4月，美国以反恐怖活动为借口，在轰炸利比亚得手后，立即把矛头指向叙利亚。美国声称只要获得叙利亚参加恐怖活动的证据，就将空袭叙利亚。以色列本来一直以坚持和它对抗的叙利亚为主要施压对象，从1985年底以来同叙利亚的军事对抗不断加剧，此时便趁机扬言要发动“一场全面战争”，“反对恐怖主义”。它紧急征召后备役军人，调动了2.7万军队和1700辆坦克部署在黎巴嫩南部边界地区，企图用战争的威胁来迫使叙走上妥协之路。叙利亚针锋相对，加强在戈兰高地和黎巴嫩贝卡谷地的军事部署。叙总统阿萨德声明，叙如遭到进攻，必进行反击。以叙军事冲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但因叙拥有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且有叙苏友好条约为后盾，故以色列不敢轻易动手。叙也力求缓和同美以的关系。叙领导人声称，叙不搞恐怖主义，并将尽力使在黎巴嫩被扣的人质获释。到5月中旬，叙以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但美国对叙施压的政策未变。几个月后风波又起，10月24日，英国以叙利亚参与恐怖活动（在伦敦希思罗机场的以色列班机上置放定时炸弹）为由，宣布同叙利亚断交。美国立即撤回其驻叙大使，其后又宣布禁止向叙出口粮食，禁止向叙出售飞机、高技术和中止两国空中运输等制裁措施。

四、中东和平势头重趋活跃，但仍未打破僵局。

在约巴协议中止，原有的和平进程陷于停滞之后，有关各方开始试探新的和平渠道。

1. 摩洛哥和以色列于1987年7月21~23日在摩洛哥举行首脑会晤。摩洛哥不是阿以对阵的前线国家，在中东问题上历来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以色列则想通过与摩洛哥单独会谈为阿以和谈制造气氛，促使阿拉伯国家进一步分化，孤立巴解和激进的阿拉伯国家。以色列总理佩雷斯更因交班在即，亟欲在任期内取得一点外交成就，积累政治资本。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早就与以色列作为工党领袖的佩雷斯有过秘密接触。1985年11月，担任总理的佩雷斯致函哈桑二世，希望同他会晤讨论中东问题。1986年3月，佩雷斯访法时会见了哈桑二世的特使。经过双方的频繁秘密接触，佩雷斯到摩洛哥与哈桑二世进行了会谈。哈桑二世着重介绍了非斯方案，

并参照联合国安理会242号决议、里根方案和非斯计划提出了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新方案。主要内容如下：在约巴邦联范围内建立一个巴勒斯坦人的“祖国”；它的边界由有关各方谈判划定；该邦联内的阿拉伯行政当局将负责约旦河西岸的经济管理，安全问题由以色列与阿拉伯方面共同负责；为支持这一方案，摩洛哥负责建立与有关各方之间的直接接触。佩雷斯则提出了十点和平计划，主要内容是：以色列同意与放弃暴力的巴勒斯坦领导人和谈，讨论西岸主权问题；在中东停止暴力行动一年；在此期间以色列保证不吞并不被占领土；在耶路撒冷实行自由朝圣；举行中东国际会议。由于双方观点严重分歧，会晤未取得具体成果。

哈桑二世是继已故埃及总统萨达特之后，与以色列首脑公开会谈的第二位阿拉伯国家首脑。激进的阿拉伯国家对摩以首脑会晤同声谴责。叙利亚宣布与摩断交，利比亚指责哈桑二世严重违反了摩利联盟条约。约旦、沙特、科威特未明确表态。只有埃及表示支持。7月26日，哈桑二世辞去自1982年非斯会议以来就担任的阿拉伯首脑会议主席的职务，以“使摩洛哥不致成为举行下届阿拉伯首脑会议的障碍”。

2. 美国力图撮合约、埃、以三方会谈。

美国在促成了摩以首脑会晤后，于7月下旬和8月下旬派遣副总统布什访问埃及、约旦、以色列三国，谋求在华盛顿举行一次由三国首脑参加的会议。接着又派中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墨菲到中东穿梭访问，在约旦和以色列之间进行协调。美国自1985年巴解明确表示拒绝承认242号决议后，就力图甩开巴解实现约以直接对话，按照戴维营方式实现约以单独媾和，现在则想通过埃、以、约三方会谈来打破中东僵局。但是约旦8月份宣布在解决阿以矛盾问题上它将坚持“三条红线”：决不同以色列单独谈判；在耶路撒冷问题上决不动摇；在阿拉伯被占领土问题上一步也不退让。约旦还强调任何中东问题的解决都必须有巴解组织参加。美国的图谋未得实现。

3. 埃以在塔巴问题上达成协议，埃以首脑实现会晤。

塔巴是埃及在西奈的一块领土，面积仅一平方公里，位于西奈半岛南端，濒亚喀巴湾。1967年以色列占领西奈后，将塔巴建为旅游区。1982年以色列根据戴维营协议撤出西奈时，拒绝将塔巴归还埃及。于是产生了塔巴争端。四年多来，埃及为恢复对塔巴主权，多次与以色列谈判，未得结果。塔巴问题成为埃以关系正常化的障碍之一。1986年，埃以双方在美国推动下，于8月10日达成协议将塔巴争端交国际仲裁，9月10日，双方进一步就国际仲裁人和争议地区的标界问题达成协议。这就为埃以首脑会晤打开了大门。美国在埃以约三方会谈计划落空后，把新的希望寄托于埃以首脑会晤。埃及也需要改善和以色列的关系，以缓和其经济困难（埃及希望美国减少贷款利率并增加经济援助），增强其在中东和平进程中的地位。以色列则希望通过埃及争取到更多的阿拉伯国家。在此情况下，以色列总理佩雷斯与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于9月11~12日在埃及亚历山大港举行会晤。会谈的主要成果是：两国决定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增加经济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宣布1987年为和平谈判年，呼吁各方“在这一年里致力于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崇高的共同目标”，同意召开中东国际会议，并为此成立一个联合筹备委员会。但在会晤中以色列仍然坚持不承认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和巴解的合法代表权，故中东和平进程并无实质进展。

这次会晤毕竟是埃以关系从多年冷冻走向正常化的标志，它表明阿以直接谈判的势头有了新的进展。

4. 酝酿召开中东和平国际会议的活动增多，但通向会议之路荆棘满途。

约旦国王侯赛因在中止约巴协议后，即多方努力为召开中东国际会议展开一系列外交活动。他的努力收到一定的效果。

苏联为与美国争夺在中东的影响，从戈尔巴乔夫上台以来，调整中东政策，一面巩固与激进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一面加强同温和派国家的关系。在巴解内部分歧加剧之时，苏力促各派和解。此外，8月18日，苏同以色列在赫尔辛基就恢复两国领事关系举行会谈。9月22日，佩雷斯与谢瓦尔德纳泽在纽约会晤。苏联在开展上述外交活动的同时，还积极介入中东和平进程。戈尔巴乔夫针对美以的与阿拉伯国家逐个直接谈判、单独媾和的计划，于7月提出召开有美苏共同参加的中东国际会议的建议，以改变美国包揽和谈、排斥苏联的局面。8、9月间，苏联接连派出彼得罗夫斯基和沃龙佐夫两名副外长到约旦、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活动。许多阿拉伯国家表示支持苏联关于召开中东国际会议的建议。一时间，中东和平进程的势头显得重新活跃起来。

美国对于召开中东国际会议则持消极观望的态度，既不公开赞成，也不公开反对。它认为：世界石油供过于求，中东石油在美国全球战略中地位下降；在阿以力量对比中，以色列具有军事优势；阿拉伯求和倾向已增长，阿以之间无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危险。加之美国受伊朗门丑闻的影响，在中东威信下降，一时难以在阿以和谈上有所作用，所以美国不急于解决阿以冲突，采取等着瞧的态度。

阿拉伯国家对召开中东国际会议的态度也不一致。约旦、摩洛哥、埃及和巴解主流派积极赞同，但叙利亚认为在阿以实现战略平衡以前，谈也无益。

以色列内部，工党赞成召开中东国际会议，利库德集团则反对。

因此，对于中东和平会议虽然一度议论甚多，但实际步子却未迈开。

五、以色列政府换班。

根据1984年9月以色列工党和利库德集团组成联合政府轮流担任总理的协议，1986年10月中旬，利库德集团首脑沙米尔由外长换任总理，工党领袖佩雷斯则由总理改任外长。两党在不承认巴解组织和不承认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等重大战略上并无二致，但在解决阿以冲突的策略上则有严重分歧。工党的某些政策比较灵活，主张以西岸某些领土换和平，不在占领土地上增设新定居点，有条件地同意召开中东国际和平会议。利库德集团则奉行强硬政策，即以军事力量为后盾推行“扩张主义”和“大以色列计划”，反对“以领土换和平”的原则，反对召开中东国际和平会议。

沙米尔上台后受到以色列经济和军事实力及工党力量的牵制，不能一意孤行。他无法改变佩雷斯执政时所造成的既成事实。他承认，“任何一个单枪匹马的政府都不会取得成就。所以他一再宣称，“将继续执行联合政府共同的政策”。但他会使以色列外交政策带上强硬的色彩，使中东和平进程变得更加困难，更加复杂。

（袁世垠）

南部非洲局势

1986年，南非和南部非洲局势继续动荡不安。南非总统博塔对种族隔离制度进行了有限的